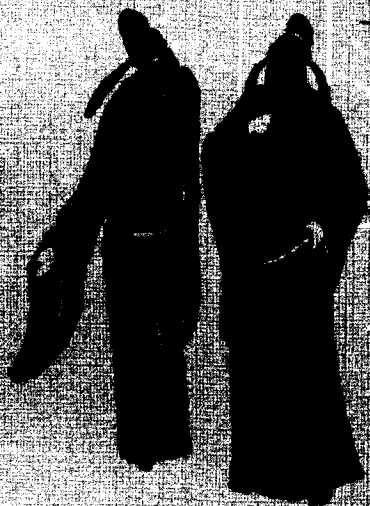


宋初朋黨

與太平興國

三年進士

何冠環 著



44.07

宋初朋黨與
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何冠環 著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汪聖鐸

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何冠環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4印張·2插頁·8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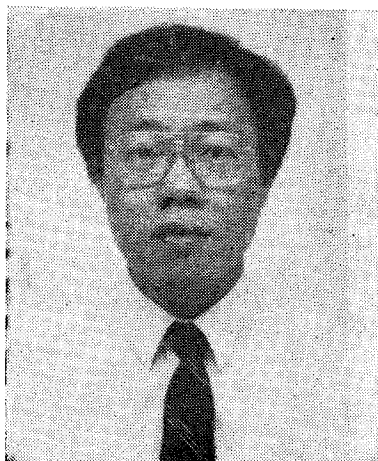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冊 定價：6.00元

ISBN 7-101-01249-3/K·532

敬獻給：

羅球慶老師、陶晉生老師



作者簡介：

何冠環，1955年生，廣東新會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哲學博士。專攻北宋史。曾任教香港浸會學院、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現任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曾撰有《司馬光通鑑與金帝王學》、《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宋太宗箭疾新考》、《金匱之盟真偽新考》、《論靖康之難中的種師道與種師中》等論文多篇。

引言

以文官爲主角的北宋朋黨之爭，史學界過去多着眼於鄉誼、政見、道德及職能的因素，從而引申出“南人北人之爭”、“新舊黨爭”、“君子小人之爭”和“宰相台諫之爭”等看法。然而，從許多案例發現，北宋士大夫交朋結黨，其實沒有局限於任何一種尺繩，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標準，可以說既是因人而異，亦因時而異。他們可以憑鄉誼來結納同氣，也可以藉詩文廣交天下英豪；他們中有人固然會奉聖賢之教，守正不阿，以識“君子”爲幸，但亦有人會計算個人利害而甘心依附權勢，作個投機“小人”。在這本小書裏，作者想指出一點，就是北宋士大夫，也像唐代牛李黨爭的牛黨一樣，靠科舉制度所衍生的座主門生及同年關係，交朋結黨。而本書的研究取向，則是集中於宋初“同年進士”與朋黨關係的一方面。大概由於宋代登科錄殘缺不全，誰人與誰人份屬同年關係不易考見，故此過去研究宋代黨爭的學者，似乎尚少從這一角度探究這一問題。本書作者故此不憚淺陋，嘗試透過研究宋太宗（976—997在位）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的政治生涯這一個案，從同年進士結黨的角度，探究北宋朋黨之爭的面貌。

本書所以要選擇這一榜進士來研究，因為他們是宋代第一羣公然以同年關係結黨的進士。這一榜及第的進士共七十四人，姓名可考的凡十七人，存疑六人。他們當中，熱衷結黨或介入黨爭的有十一人¹。宋代大有才名的胡旦(955?—1034?)，既是這一榜的進士，又以黨魁自任。^①除胡旦外，被奉為首領的，還有這一榜的

省元趙昌言(945—1009)和探花馮拯(958—1023)。至於他們的死黨，包括李昌齡(937—1008)、董儼(945—1008)和陳象輿(?—1008 後)(按：陳象輿是否胡旦的同年仍待考)。而這一榜的榜眼、擠身宋初名臣之列的田錫，和名列西崑詩人的薛映(951—1024)，雖儘量持着“朋而不黨”的態度，但他們與胡趙交好，最終亦未能避免捲入黨爭。本書重點論述的，便是他們這幾個人的仕宦生涯，特別是胡、田、趙和馮四人的事跡。至於他們那些沒明顯介入黨爭的同年之生平，則僅會旁及。本書無意寫成一本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合傳，蓋本書的主題是析論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係。為此，他們在政治以外的成就或表現，例如胡旦在宋代經學上的地位，田錫、薛映等之詩文，在宋初文壇的地位，就敘述從略。^②

本書敘事的時代，起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迄宋仁宗(1023—1063 在位)景祐元年(1034)胡旦逝世止，歷太宗、真宗(997—1022 在位)和仁宗三朝凡五十多年。這一段屬於北宋前期的艱難歲月，宋廷一方面經歷了幾番因繼統紛爭而生的政治危機，而另一方面，也為遼夏的交侵而難得安寢。然而內憂外患並未使宋廷士大夫時常和衷共濟；相反，在許多時候，由於應付內外危機的政治立場和取向之迥異，與及個別人物的政治野心，他們往往同舟而不共濟，務黨同而伐異。胡旦、趙昌言、馮拯等就是這類有野心而好結黨自固的人。正如上述，本書即以析述他們的政治生涯為經，而以論述他們藉同年關係結黨之事為緯。本書前半部以胡旦、趙昌言為論述重心，後半部則圍繞馮拯的宦途討論，而田錫的生平事跡，則會貫穿前後兩部。

本書雖以胡旦一榜人的政治生涯為論述中心，但對太宗以後迄仁宗初年所發生的各次黨爭，均加以剖述，不管胡旦一榜人擔任的角色是主角還是配角。故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又不啻是一部宋初黨爭史。不過，為免主客易置，正文儘量以寫胡旦一榜人參予黨爭

之事跡爲主，其他相關的史事考證和解說，則放入注文。

本書除引言和結論外，書後有附錄三，一爲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可考之親屬名目，二爲引用書目，三爲主要參考論著。

對宋初政治人物不太熟諳的讀者來說，胡旦這一榜人的名字是相對地予人陌生感覺的。雖然以官位計，他們一榜人也有馮拯登庸，趙昌言與李昌齡參政；而田錫、薛映、張鑑(947—1004)也可擠身名臣之列；但若論人才，論事功，胡旦一榜人總的來說，既不及前一榜的呂蒙正榜(太平興國二年，977)，更比不上有“龍虎榜”之稱的後一榜蘇易簡榜(太平興國五年，980)；^③不過，正如上述，胡旦這一榜人，卻是“首開風氣”，以同年關係結黨。他們在宋太宗、真宗朝多次介入黨爭，雖多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們敢攻訐權貴，抨擊朝政，比起他們多數循默的同僚，仍有可取之處。

本書要考證的地方不少，除了一開始要考出有甚麼人在太平興國三年登進士第外，還要弄清楚胡旦等人仕歷之具體年月，而宋元人筆下有關他們之事跡之真偽，也得一一辨明。這些考證大部分都會放在注文，爲此，本書之注文之篇幅頗多。

① 胡旦字周父，亦作繼周，山東濱州渤海人。生卒年不詳，按《東都事略·胡旦傳》載其得年八十，而胡旦妻盛氏(?—1034後)於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月獻上其遺書《續演聖論》，疑胡旦即逝於是年。若據此逆推胡旦之生年，則胡旦當生於後周世宗(在位 954—959)顯德二年(955)。參見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卷三十八，頁五下(總頁 596)；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11月，卷一百一十五，頁 2688。

② 有關胡旦在宋代經學和漢史研究的地位，可參閱金中樞：《宋代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3月，第一章，第二節，《胡周父的經學》，頁 62—68。關於田錫詩文的評論，最近期的論述，可參閱祝尚書：《試論宋初西蜀作家田錫》，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990年第2期,頁64—70。

- ③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被譽為“龍虎榜”，始見於龔鼎臣(1010—1086)之《東原錄》，另方回(1227—1307)之《瀛奎律髓》亦載呂蒙正一榜也曾被劉昌言(942—999)譽為“龍虎榜”。參見龔鼎臣：《東原錄》，《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16—17；方回：《瀛奎律髓彙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卷五，頁211，《上呂相公》。關於呂蒙正及蘇易簡兩榜人才之盛，拙文有所論及。可參見 Ho Koon-wan (何冠環)，*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962—1023) And His T'ung-nie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h.D.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1990; pp.34—41; 58, 81—84.

責任編輯：汪聖鐸

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何冠環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4印張·2插頁·88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冊 定價：6.00元

ISBN 7-101-01249-3/K·532

目 錄

引言

第一章	“同年關係”在宋初的發展.....	1
第二章	遺材競奔的太平興國三年榜.....	7
第三章	初試啼聲：胡旦、田錫和趙昌言的 早年仕宦(978—983)	14
第四章	公然樹黨：從雍熙北伐到端拱政爭 (984—988)	24
第五章	暗通宮闈：黨爭與繼位之爭	31
第六章	“君子”與“小人”之爭：趙昌言、馮拯 與真宗初年的黨爭(997—1003).....	53
第七章	隨波逐流，左右逢源：馮拯與真宗 後期的黨爭(1004—1022)	64
第八章	其有後乎：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之子孫	91
結論		99
附錄：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親屬名目		102
引用書目		106
主要參考論著		113

第一章 “同年關係”在宋初的發展

“同年”這種古代中國獨有的社會關係，和“座主門生”關係一樣，都是科舉制度的產物。^① 同年是甚麼？唐中葉名臣李絳（？—830）答唐憲宗（805—820在位）之問時即言“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② 而宋初名臣柳開（947—1000）在致其同年李巨源（？—992）書中，更清楚明白說出同年關係為：

由辭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年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于孫累代，莫不為暱比，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君子者成衆善，以利民與國；小人者成衆惡，以害國與民。^③

從唐代始，登科進士互稱同年兄弟，十分普遍；^④ 不過由某一榜進士單獨結成的政治集團，在唐代卻罕見。雖然唐代也曾出過包括韓愈（768—824）、李絳（？—830）及王涯（？—835）在內的“龍虎榜”，也有過令狐楚（765—836）、蕭俛（？—822後）挽救同年皇甫鏘（？—820後）不被穆宗（820—824在位）所誅的事；但他們並未在政壇上獨領風騷。^⑤ 台灣近年來曾有學者專門述唐代進士與政治的關係，但只籠統地說登科進士結為集團；然卻舉不出哪一榜進士曾結成政治集團。^⑥ 可以解釋的是，唐代取士每榜只二三十人；取士這麼少，能攀上高位的人就相應的不多，而依靠同年關係結黨也就不易了。

宋太祖（960—976在位）得國後，恢復科舉；不過太祖一朝取士，和唐代一樣少，每科平均只有十餘人。太祖在建隆三年（962）九

月下令禁止舉子與知貢舉以“座主”“門生”相稱，以防結黨。^⑦不過他並不禁同榜進士以“同年”相呼，而且還恢復了唐代“曲江宴飲，雁塔留名”之俗，讓新科進士得以訂同年之誼。^⑧大概太祖認為他們人數有限，又散處各地，成不了黨，結不了派，故不用防範。

事實上，在五代或太祖朝登科的進士，從未有倚靠同年關係結成有力的朋黨。即如在太祖開寶六年(973)登第的柳開，他那一榜(共二十七人)已是太祖朝取士次多的一榜；但照他所說，他的同年在登科十八年後，歿者已半，而他們當中能登上較高位的，只有狀元宋準(?—987 後)和李巨源。然他說這話時，宋準已死而李巨源已貶，餘下的則如枝葉飄散。^⑨另外，太祖一朝的十五榜狀元，除了第一榜(建隆元年，960)的楊礪(931—999)和最後一榜(開寶八年，975)的王嗣宗(942—1019)總算在真宗時晉身樞密副使外，其他人都與二府無緣；而他們各自的同年也更不成氣候了。^⑩

至於在五代登科，而在太宗朝拜相的盧多遜(935—986)，雖然曾援引過他的同年李穆(?—984)，而當盧多遜失敗時，李穆也受累降職，到了李穆陞任參知政事時，又回過頭來幫助盧多遜從崖州北還；但是盧李兩人並未以同年之誼結黨，這點是太宗也承認的。^⑪

同年進士得以結成朋黨，要到太宗時。太宗登位後，大改太祖的取士政策。太宗大開登仕之門，光是他登位後的第一榜(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已共取士五百人，遠超太祖朝十七年取士的總數。^⑫太宗大量取士外，又擢用進士出身的人，好像呂蒙正，登科才十一年，便得以拜相。^⑬總之，太宗的用人政策，給天下英豪前所未有的機會。那些驟登高位的進士，相率援引他們各自的同年、鄉里及故舊，進入政壇，角逐權位。

新科進士在登科後除了舉行期集外，並合資刊印“同年小錄”，據宋人筆記所載，宋初當新科進士期集時，他們便以甲次高下，定

出錢多寡，刊印“同年小錄”和付遊宴之費。有時富有但名次卑的則所出無幾；相反貧而偏名次高的卻要多付，弄到要借貸。當然，朋友尚有通財之義，何況情同兄弟，名注“小錄”的同年，一般都有求必應。^⑭期集和印小錄可以說是他們建立親密同年關係的基礎。他們登仕後，一有機會便走在一起，聯絡感情，鞏固“年誼”，好像本書主角胡旦等人，便不時在京師和地方把酒言歡及互通消息。^⑮這種同年進士詩酒文會之風俗，由北宋初到南宋末，一直至元代，歷久不衰。這些士林視為佳話之盛事，既著錄於宋元人文集，亦見於碑刻。這裏值得一書的是南宋大詩人范成大(1126—1193)，在宋光宗(1189—1194 在位)紹熙元年(1190)正月，因應他們一榜的同年進士(隆興元年，1163)十二人相聚於蘇州而撰的《吳下同年會詩碑序》，其中便曾描述宋代新科進士締結“年誼”的情況。范石湖這番生動的描述，正好印証補充上文所引柳開的說法，為何同年進士誼同兄弟：

“進士科始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外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尚矣。唐人尤熹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為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門，序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忽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⑯

同年進士賦詩飲酒，吟風弄月之餘，對彼此之仕途昇降並沒有忽略。他們互為奧援，已是心照不宣。正如柳開所說，既情如兄

弟，也就愛屋及烏，以照顧同年的親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就以太平興國二年和五年的進士為例，臧丙(940—992)之於馬汝士(?—980 前)，馬亮(959—1031)之於戴永(?—981 後)，都是情同手足，並推愛於同年之親人。^⑩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常常來個黨同伐異，分門別戶。而始作俑者正是胡旦一榜人。

- ① 關於唐代登科進士拜座師之情況，可參閱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頁301—304；至於唐代進士登科後隨即結為同年兄弟的情形，以及這種“年誼”之深淺狀況，五代人王定保(?—955後)有十分詳細的描寫，參見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卷一，頁3—4；卷三，頁24—33，40—43；卷九，頁94—95，99—100。
- ② 參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6月，卷二百三十八，頁7688—7689，“憲宗元和七年(812)正月辛未條”。按李絳當時被人指對其同年許季同(?—812後)徇私，故憲宗詰問李絳，是否“人於同年固有情”。李絳回答憲宗之問，當然不肯承認於同年有情。
- ③ 柳開：《河東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年(影印1936年本)，卷九，頁61—62。
- ④ 參見注①。
- ⑤ 胡仔(1082—1143)：《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香港：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11月，卷二十一，頁151。亦見王應麟(1223—1296)：《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卷一百一十五，頁三十九(總頁2138)。《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頁7778，“憲宗元和十五年(820)正月辛亥條”，按是時穆宗已繼位。
- ⑥ 卓遵宏：《唐代進士與政治》，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3月，第四章，“進士士風敗壞與政治之關係”，頁140—142。
- ⑦ 參見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頁291—292，附錄一：《宋代科舉一覽表》；《長編》，第二冊，1979年8月，卷三，頁71。按太宗以後，宋人仍舊座主門生照稱如儀，大概太祖這番禁令也行不了多久，好像柳開上書給他的座師李昉(925—996)，便題為“上主司李學士書”。參見《河東先生集》，卷七，頁49。

- ⑧ 《長編》，第二冊，卷十四，頁297—298；《河東先生集》，卷九，頁61。按開寶六年(973)，太祖賜是科狀元宋準(?—987後)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則同年進士宴飲之俗當已復(《長編》卷十八，頁393則云“聞喜宴”後周時已有之)，而柳開致書李巨源，直以同年相稱，亦見同年之稱呼相沿未廢。
- ⑨ 《河東先生集》，卷九，頁61—62。
- ⑩ 《長編》，第四冊，1979年10月，卷四十三，頁907, 917；第七冊，1985年11月，卷八十三，頁1889。按楊礪要到真宗咸平元年(998)才拜樞密副使，距他點狀元足有三十八年；而王嗣宗在太祖開寶八年(974)奪魁，直至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才入二府爲樞密副使，足足要等四十年。宋人筆記載他以老辭副樞之位時，曾對真宗說：“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參見陳鵠(?—1080後)：《西塘集耆舊續聞》，《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十，頁67。
- ⑪ 《長編》，第三冊，1979年8月，卷二十三，頁518；卷二十四，頁541, 546, 558；卷二十五，頁572—573；王明清(1127—1201後)：《玉照新志》(汪新森校點)(與《投轄錄》同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卷一，頁9；司馬光：《涑水記聞》(鄧廣銘、張希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9月，卷二，頁37—38。
- ⑫ 太祖一朝十五榜，所取進士共一百八十八人，諸科共一百六十一人，特奏名一百零六人，合計不過四百五十五人。參見何忠禮：前揭書，頁291—292。
- ⑬ 呂蒙正於太平興國二年(977)登科，到端拱元年(988)卽拜相，前後僅十一年。《長編》，第三冊，卷十八，頁394；卷二十九，頁647。
- ⑭ 王栐(?—1227後)：《燕翼詒謀錄》(誠剛點校)(與《默記》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9月，卷五，頁49。關於宋代傳世的“同年小錄”，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收入《四庫珍本八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據葉夢得(1077—1148)的記載，這種小錄登載了每人的生辰年月日時，用來敘齒。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侯忠義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卷五，頁67。至於宋代“同年小錄”的編纂狀況，可參閱周必大(1126—1204)：《文忠集》，《四庫珍本二集》，卷四十四，頁八至十，《題盛京登科小錄》；《錄洪景廬容齋續筆》。據周必大的說法，在南宋時可以見到的北宋登科小錄，最早是咸平元年一榜。到元代，編修登科小錄之俗尚存，有些地方，甚至取鄉試發解進士的姓名，像登科記一樣付梓印行以謀利。參見程端禮(?—1351後)：《畏齋

集》，《四庫珍本別輯》，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卷三，頁六至七，
《江浙進士鄉會小錄序》。陶宗儀(1316—?)：《南村輟耕錄》，北京：中
華書局，1959年2月點校本(1980年3月第二版)，卷二十八，頁344。

- ⑮ 胡旦一班同年進士，在京則聚會於趙昌言之第，在外則互相探訪。參見
本文第四節，及僧文瑩(?—1078後)：《玉壺清話》(楊立揚點校)(與《湘
山野錄、續錄》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卷三，頁31—32。
文瑩在這條筆記載胡旦先後往揚州和杭州探望他的同年董儼(945—
1008)和薛映，並受到二人熱情款待。雖然文瑩這條記載在時間上有
偏差，但胡旦等常在地方上互訪聯誼，當是不假。參見第五章注⑮之
考証。

- ⑯ 范成大所撰之《吳下同年會詩碑序》及其同年十餘人之詩刻，收入陸增
祥(1816—1882)：《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
影印1925年吳興劉氏希古樓本，卷一百一十六，頁821—823。同年進
士會宴於京師，或相聚於地方，宋人以至元人文集均有載，可參見陳襄
(1017—1080)：《古靈集》，《四庫珍本三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
年，卷十八，頁三至五，《同年會宴詩序》；蔡襄(1012—1067)：《端明
集》，《四庫珍本四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卷七，頁十六，《清
暑堂會同年》；宋褰(?—1330後)：《燕石集》，《四庫珍本二集》，台北：
商務印書館，1971年，卷十二，頁十六至十七，《同年小集詩序》；沈夢
麟(?—1286後)：《花谿集》，《四庫珍本九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卷三，頁五，《北京同年鄉會》。

- ⑰ 《長編》，第三冊，卷二十，頁452；第七冊，卷八十五，頁1945。